

民族問題譯叢

民族學專輯

337
1
6

民族問題譯叢

民族學專輯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輯
民族出版社出版

民族問題譯叢

〔增刊〕

民族學專輯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

北京西郊

電話：(2) 2037

出版者 民族出版社

北京國子監特54號

本增刊零售

每冊定價1.00元

中央民族印刷廠承印

代銷處 新華書店

印數：1—2,000

民族問題譯叢

民族學專輯目錄



蘇聯民族學的任務	斯·普·托爾斯托夫	[1]
蘇聯民族學的基本任務和發展途徑	斯·普·托爾斯托夫	[5]
蘇聯民族學十五年及其以後的任務（1918—1933年）		[13]
列寧與民族學的現實問題	斯·普·托爾斯托夫	[18]

* * * *

經濟文化類型與歷史民族區	莫·格·列文 恩·恩·切波克薩羅夫	[30]
--------------	----------------------	--------

對莫斯科工人文化與生活的民族學研究	恩·恩·切波克薩羅夫	[41]
-------------------	------------	--------

關於集體農莊農民的民族學研究的討論

論集體農莊農民的民族學研究	普·伊·庫什涅爾	[54]
關於集體農莊農民的民族學研究的問題	納·伊·沃羅必耶夫	[59]
關於集體農莊民族學研究的問題	納·阿·基斯略科夫	[63]
關於集體農莊農民的民族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奧·納·伏茲第維燕斯卡婭 爾·普·拉·舒·克	[65]
論集體農莊農民民族學研究中的若干因素	耶·納·斯杜琴涅茨卡婭	[69]
對中亞細亞集體農民的民族學研究	奧·阿·蘇哈列娃	[73]

* * * *

研究伏爾加河中游各部族現代集體農莊鄉村生活

及其形成歷史的資料搜集大綱	納·伊·沃羅必耶夫	[83]
蘇聯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集體農莊農民文化和生活的		
民族學研究資料收集大綱	普·伊·庫什涅爾	[105]

- * * * *
- 論新的民族分布圖編繪法 普·耶·切爾列茨基 [110]
俄羅斯歷史—民族分布圖本 普·伊·庫什涅爾 [119]
中亞細亞歷史—民族分布圖本 特·阿·日丹科 [126]

- * * * *
- 蘇聯博物館中民族文物陳列的基本問題 勒·普·坡塔波夫 [134]
蘇聯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新展覽 耶·奧爾洛娃 [141]

- * * * *
- 德國民族學的若干問題 弗·什捷依尼茨 [147]
十年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學 (1945—1955年) 奧·納果基爾 [157]

- * * * *
- 爲英帝國主義服務的民族學中的功能學派 德·阿·奧利送羅格 [165]
伊·伊·波·切·興
英美種族主義 莫·格·列·文
雅·雅·羅·金·斯·基 [185]
恩·恩·切波克薩羅夫
種族主義及其社會根源 雅·雅·羅·金·斯·基 [208]
莫·格·列·文

蘇聯民族學的任務

斯·普·托爾斯托夫

民族學是歷史科學的構成部分，其任務在於用直接觀察、科學記述和歷史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世界不同的族在人種和民族特徵上，在他們的變遷發展上的文化的、生活的特點，從而解決各族的起源問題，使他們的遷移史和分布史得以復現。民族學資料（即一些需要特別加以系統研究的民族生活的活生生的現象）的專門性質，是民族學被分出來作為一門特殊歷史科目的主要理由，民族學家正從事解決的一些歷史問題的範圍，也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狹義的歷史與民族學的關係正如歷史與考古學的關係一樣，它們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條清楚的界線。因為許多民族學家，不僅要在各族現實生活現象的研究上，同時還要在各族歷史上的文字記載的史料上進行工作，並且還要參加考古方面的發掘工作。

民族學家所研究的那些對歷史科學發展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都是離開民族學的資料就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是非常之多的。不引用民族學方面的資料，不可能正確地說明勞動群衆的歷史，因為階級社會內用文字記載的史料，對勞動歷史群衆的敘述非常不够，有時還要歪曲它；不引用民族學方面的資料，也不可能對原始公社制度的發展進行充分的研究，和復現那些不久以前還沒有文字記載的各族的歷史。

黨和政府要求歷史學家特別注意研究蘇

維埃社會史、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些任務，同樣也擺在民族學家的前面，因為離開民族學方面的資料，這些任務就不可能得到圓滿的解決。

蘇聯民族學已經轉向于研究合乎現時需要的題目。它研究着蘇維埃時代的生活、首先是集體農民的生活。1948—1953年，“蘇聯民族學”雜誌共發表了45篇關於研究我國各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莫爾達維亞人和伏爾加河沿岸、波羅的海沿岸、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及其他各族）集體農民生活的論文。1951年，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和若干加盟共和國研究所已着手撰擬個別集體農莊農文化與生活的專論。目前已完稿的有關于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納曼干省斯大林集體農莊的、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波列協省霍依尼克區“布爾什維克”集體農莊的民族學方面的專論。已出版的有關于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納巴德區馬林科夫集體農莊的專論。在“中亞細亞民族學論文集”中，刊載有關于馬雷省土庫曼族集體農民經濟和生活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專論。

在蘇聯民族學家面前還擺着研究蘇聯工人階級生活的任務。1950年，“蘇聯民族學”雜誌發表了恩·恩·切波克薩羅夫的一篇研究莫斯科斯大林工廠和三山紡織廠工人生活與文化的民族學論文。這是初次的、

尙不是完全成功的嘗試。1953年，同一雜誌刊印了烏·尤·克魯普揚斯克的一篇標題爲“19世紀下半期烏拉爾工人民族學研究的嘗試”的論文及阿·依·羅巴基澤的一篇標題爲“奇阿圖拉礦工家庭生活某些特點”的論文，羅巴基澤也在格魯吉亞出版了同一題目的書籍。有幾篇關於南烏拉爾、烏茲別克和基爾吉茲工人生活的論文正在準備付印。還有許多研究蘇聯工人階級生活的學位論文。

1953年提出來的學位論文有：阿·斯·庫尼茨庚的“伏羅希洛夫工廠工人的社會主義生活”，阿·格·特羅菲莫娃的“巴庫的石油工人（巴庫奧爾忠尼啓則區文化與生活專論研究上的嘗試）”，1954年提出來的學位論文有烏·尤·帕斯屠興的“博里斯拉夫石油區工人的生活”。

研究工人生活的題目應該經常列入民族學科學研究機關的工作計劃中去。重要的是盡力提高工人階級生活研究方面的初步成績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民族學所保持的、似乎只有農民才是“民族”代表者和民族文化傳統體現者的這種反動的立場。

民族學家們正在積極參加編寫有關拉脫維亞、立陶宛、烏茲別克斯坦、基爾吉茲、哈薩克斯坦、雅庫特、達格斯坦、卡巴爾達、莫爾多瓦及其他蘇維埃共和國歷史的著作。他們正在研究以前“沒有文字的”各族人民的歷史。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勒·普·坡塔坡夫的“阿爾泰人簡史”及“哈卡斯人民族誌與歷史簡編（7世紀至19世紀）”，斯·阿·托卡列夫的“雅庫特人簡史”，特·阿·日丹科的“卡拉卡爾巴克人歷史上的民族誌概論”，及其他許多論文。

民族學的最重要任務之一，是爲記述整個民族或一個民族的某一部分的文化與生活而組織專題研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已着手對各該共和國個別區域進行全面的民

族學調查。調查結果應該總結起來寫成專論。1954年，“中亞細亞民族學論文集”刊載了格·普·華西里葉夫的“土庫曼族諾胡爾人”這篇著作。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人員烏·恩·別里澤爾完成了“科米茲揚人與科米族彼爾亞克人”這一專論。1953年出版了斯·烏·伊凡諾夫的“19世紀至20世紀初西伯利亞各族造型藝術資料”這一篇幅巨大、插圖豐富的專論，并準備了“東方斯拉夫人民族學論文集”第一卷，該論文集輯載了若干關於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住宅與服裝的專論。厄·姆·彼舍烈夫論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製陶業的大部頭著作已經完稿。但不能不指出，這類民族學專論的編寫工作是應當予以發展的。

在這些總結性的著作中還應當列入說明物質文化現象的地理分布和類型的民族圖誌。這方面的成就在目前還不顯著。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繪製的關於西伯利亞各族人民物質文化的圖誌，由於出版方面的缺點，迄今還未印出。

現在，民族學研究所正着手繪製俄羅斯民族圖誌；1955年還打算付印關於俄羅斯民族農具、住宅和服裝史的分冊。在中亞細亞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會議上，一致表示了編製中亞細亞民族圖誌的願望。

在民族學家面前還擺着一個任務，這就是不但要協助研究各族過去情況的歷史學家，而且要幫助在蘇聯各族人民的經濟與文化方面進行實際工作的人員。必須把蘇聯各族物質文化方面大量的不爲一般人熟悉的文獻資料普及開來。刊印我國各個共和國、省和區的民族圖誌和照片集，將有助于創造新的建築群、生活上的藝術裝飾作品以及服裝樣式等等。

現在蘇聯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的重要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民族和部族形成的問題。蘇聯社會主義民族和部族形成的過程，

因蘇聯各族人民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所走的歷史道路不同而有所不同。研究族的形成過程，要求廣泛引用民族學的資料。多少年來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這個問題是以阿爾泰薩揚高原和達格斯坦各族人民為實例的。現在準備出版的著作有“西伯利亞南部各族形成的過程”、“達格斯坦各族社會主義文化與生活簡史”。被搜集來的一些材料使得我們有可能探索部族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是怎樣形成的，它們的文化，即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是如何發展的。

* * *

近幾年來，民族學家們研究族的起源問題的積極性已顯著降低。誠然，1951年至1953年，“蘇聯民族學”雜誌上約發表了20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但這些論文一半以上都是談的民族學研究方法論的問題，只有個別的論文才涉及到了一點本題。研究東方斯拉夫各族起源的著作幾乎沒有。在這裏長期居統治地位的是恩·雅·馬爾的謬誤的語言學理論。民族學家對於糾正錯誤和創造性地研究族的起源問題的工作做得很少。必須在族的起源問題的研究上力求實現一個決定性的轉變。民族學家們積極參加的綜合考察隊，在這一方面負有起巨大作用的使命。例如，波羅的海沿岸考察隊近三年來在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所進行的重大工作，首先是以研究波羅的海沿岸各族起源的問題為中心的。有許多考古學家、民族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在基爾吉茲考察隊中從事調查研究工作，這個考察隊的中心問題是基爾吉茲族的起源問題。各綜合考察隊的經驗令人信服地證明：要解決族的起源問題，就必須要各種不同專業的學者共同努力。

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是民族學的一個落後

部分。1951年出版的書，有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編寫的“氏族社會”、“人類起源和古代人類的分布”兩部論文集；1953年出版的書，有姆·奧·柯斯文的“原始社會文化史概論”和普·普·葉菲明科的“原始社會”兩部著作。葉菲明科的著作，主要是根據考古學的資料寫成的，這本書主要談的是原始社會史初期，即舊石器時代。

原始社會史研究上的積極性之所以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民族學家們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現代生活和非遠古的一些問題。這樣做是完全對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這樣一來就可忽視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原始社會史問題還必須予以更多的注意。

繪製民族分布圖的工作是民族學的一個重要部門。近年來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了若干供教學用的民族分布圖，繪製了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與菲律賓、及南非聯邦的民族分布圖。研究所的民族學統計與製圖室研究了繪製民族分布圖的新方法，這種方法能够把民族成分和人口密度綜合標示出來，同時也能把普通民族分布圖所沒有的民族雜居地區標示出來。

綜合性的民族學著作多卷集“世界各族誌”的創作，具有很大的意義。目前第一卷“非洲各族誌”已經出版了。已付印的有“澳洲及大洋洲各族誌”、“西伯利亞各族誌”兩卷，其餘各卷，大部分的編輯工作已經完成。

必須指出，研究人員對於研究外國民族誌的注意正在逐漸加強。1951年至1954年，已提出和答辯了許多關於非洲、法國、印度、朝鮮、伊朗及其他國家的各族人民情況的學位論文。最近又將出版多種關於非洲、印度和東亞細亞的民族學方面的論文集。

“美洲的印第安人”論文集已經出版了。

近年來在蘇聯的塔吉克斯坦、卡查赫斯坦、基爾吉茲、卡拉卡爾帕克、達格斯坦等

地出現了許多新的民族學研究的中心。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正在為它們訓練幹部，阿捷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阿爾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科學院民族學研究部就是靠一些青年幹部充實起來的。可惜各高等學校對於民族學工作人員的訓練，組織得不能令人滿意。實際上只有莫斯科國立大學和梯比里斯的大學中有民族學專業，其他許多大學的歷史系是不講授民族學這門課程的。必須創造更廣泛地獲得民族學專業教育的機會。

目前雖然還不能不承認：我們這門科學的若干幹部中尚有令人不能滿意之處，在重

要問題的研究上落了後，在幹部訓練工作中也存在有缺點，但我們畢竟是能夠指出：戰後在民族學發展中發生的轉變，現在已在相當程度內鞏固下來了。

民族學所應當研究的問題現在已盡人皆知了。民族學家應當為如何具體地解決各個科學問題而努力。我們的任務在於加強那些落後部門的工作，並與各個相接近的歷史科目的代表人物建立更緊密的接觸。各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學家，都應該集中注意力研究那些需要集體力量來研究的重要問題。民族學家的職責是協助創作我國和全世界各族人民文化史這一共同事業。

（仲弓譯，原載蘇聯“歷史問題”雜誌1954年第11期）

蘇聯民族學的基本任務和發展途徑

斯·魯·托尔斯托夫

民族學的對象問題，不久以前曾引起過（資產階級科學界還在繼續引起）很大的意見紛歧。資產階級科學界關於民族學的對象有很多定義，而且都是以極端曖昧和自相矛盾為其特徵的。可以把這些定義歸結為幾種基本的定義。最普遍的一種定義認為民族學是籠罩一切社會科學的無所不包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學往往以理論民族學的名義出現，或者，特別是在英美各國，以人類學的名義出現，這裏面又包括有社會學、民族學（本義的），考古學、人類學，幾乎集全部社會科學之大成。此外，又存在有一種傾向，把民族學解釋為只是研究原始文化史的科學，或者只是記述落後的各族人民的科學，或者只是記述風俗習慣的各種傳統形式的科學。

我們蘇聯民族學家現在所採取的定義和以上所說的有極嚴格的區別。首先，民族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但它不僅在自己的研究對象上，就是在審查研究材料的觀點上都不同于其他的歷史學科。闡明某一文化上的族的特徵、民族特點，——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民族學研究上的特點。同時，在研究各族人民文化的族的特徵和民族特點時，蘇聯民族學不但不受年代的限制，反而把每一個族從發生時起直到今天為止的全部發展時期的文化史的研究列為自己的任務。由於各族人民的文化恰好在今天顯出最豐富、最有活

力的狀態，所以研究各族人民的現代文化在民族學中就占着也必須占着中心地位。

在研究每一族的文化時，民族學遠不能隨時掌握着本身研究所需的那些材料。研究社會主義民族的或資本主義民族的文化，研究範圍內包括有多數專門學科，如技術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所研究的物質文化與技術；有關的藝術學學科、文學學科研究者所研究的各種精神文化（藝術、文學）問題；宗教史學家所研究的宗教等等。在野外或博物館中的民族學的直接研究對象主要是各個族的民族生活。但民族學在其綜合工作中也得引用研究文化各方面的各種專門學科的材料，因為各族人民的生活是不能和他們的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等等割裂開來的。因此，民族學家在從事民族生活研究時，還要依據各個專門學科所累積起來和綜合起來的全部材料的總和。

這就使得我們蘇聯民族學具有一個根本特點，即：蘇聯民族學家在工作上和其他歷史學科的人士，首先是和依靠文字史料的歷史學家及依靠物質文化遺跡的考古學家保持最密切的接觸。大部分蘇聯民族學家在實際工作中兼有文字史料研究方面的專家或古物遺跡研究方面的專家所具備的知識。這種專門知識的兼備，並不意味着民族學喪失了本身的特點，而是把它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如果問題涉及到那些迄今仍保存着資本

主義以前的生活方式（儘管這些生活方式因受資本主義影響已發生變化）的社會時，那末，民族學給自己規定的研究任務就會廣泛得多了，因為這些社會裏專門學科的研究還未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同時，這裏所發生的問題，本身不像研究資本主義民族時所碰到的問題那樣複雜，更不用說和社會主義民族的研究去比較。在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問題時，民族學家照例要親自着手于經濟、技術、文學（實際就是民間創作）、歷史和語言學的研究。總之，在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及其部族的、部落的特點時，民族學家要研究該族文化的一部分，有時是各個方面。

因此，投在民族學家直接視野內的問題範圍之擴大或縮小，要看這一族或那一族的歷史發展水平而定。但這也不是說研究資本主義民族或社會主義民族的民族學家，可以沒有責任去認識、估計和在自己的研究結論中吸收其他專門學科所研究出來的材料。

和資產階級學者相反，蘇聯學者認為民族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歷史學一定的分支。資產階級科學界一向不認為民族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而是或者把它解釋為自然科學（“人類學”這個術語是和自然科學相聯系的，而在資產階級文獻中，民族學又往往以人類學的名義出現）的一部分，或者認為是一門獨特的社會學科。在蘇聯學者看來，民族學就是歷史學的一部分。這種說法不僅確定了民族學在科學上的地位，而且也向蘇聯民族學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資產階級已經提出過的和目前正在提出的要求。

就資產階級民族學來說，有兩個概念，即關於成為文化發展基礎的諸過程的性質的概念，可以作為他們的特徵。第一個概念（即進化觀）認為某一族、或各族、或全人類所固有的文化現象的發展是一種生物學的過程，是一種在不同的文化區彼此單獨發生，

獨立發展着住宅、服裝形式、信仰形式、儀節及其他等等的逐漸變化的過程。這一切過程被認為是平行的、各自獨立的過程。這種進化觀屬於資產階級民族學進步的一翼，它已經過時了。現在成為資產階級民族學最大特點的是對於一切發展、一切運動的否定。民族文化被認為是不動的、不變的、永遠是那個樣子的。至于起源和事實上抹殺不了的變化的原因則認為是外來影響，即大抵是遷移、一些族對另一些族的影響、混合及其他等等的結果。

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的蘇聯民族學，從民族文化的運動中去研究每一族的文化，這種運動是由各種內在原因，首先是由生產力的發展及受生產力發展制約着的社會關係的發展所決定的。這一點使得蘇聯民族學和資產階級民族學有着極明顯的區別。自然，蘇聯民族學並沒有忘記各族人民歷史上的交往、文化上經常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但蘇聯民族學却把這些當作次要的過程，即僅僅把它們當作受生產力發展所決定的社會進步發展這一主要過程的補充來進行研究的。

作為歷史科學一部門的蘇聯民族學對年代因素非常注意。和傾向于忽視年代因素，不看文化中積漸發生變化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相反，蘇聯民族學給一些文化現象仔細地確定必要的年代範圍，說明每一種文化現象在時間和空間中所占的位置，并且也祇在確定了這個位置之後才轉向於歷史的概括。

資產階級民族學家由於忽視年代因素，由於忽視在時間和空間上去研究每一個文化現象的要求，就已經常常並且正在不斷地犯着極大的錯誤。關於我國北方各部族文化史上最大的民族學問題之一的養鹿業的起源問題，就是這方面一個顯著的而且屢次被引用的例子。進化主義學派的理論不根據具體材料臆測地斷言，養鹿業是畜牧業最原始的形

態，因為北方各部族的養鹿業事實上是以極大的原始性為其特徵的。根據這種臆斷，於是乎硬說養鹿業是從其他畜牧業經濟形態發展而來的，我國現代北方各部族的養鹿業被認為是如非發生於舊石器時代也至少是發生於新石器時代的畜牧業經濟的最古老發展階段的殘餘。馬爾院士的一種沒有根據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根據這種說法，馬之所以充當馴畜是由鹿之充當馴畜而來的，而鹿之所充當馴畜又是由犬之充當馴畜而來的。但正如我國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所證明，沒有任何客觀材料足以証實這種說法。我國北方居民移植過程的研究，發見養鹿業在當地傳布較晚，基本上在紀元以後；在養鹿業以前有狩獵和捕漁業，養鹿業是另一個部落從南方帶過去的，這個部落作為一個主要的歷史成分在當年參加了現今的北方各部族。西西伯利亞和東西伯利亞的楚克奇人、科里亞克人及其他從事養鹿業的部族也都是如此的。繁殖大角牲畜和馬的畜牧業比養鹿業早得多。後者的原始性完全不能從養鹿業經濟形態的古老這一點去推論，倒是可以和完全由於另一些歷史原因所引起的北方各部族的共同落後性聯繫起來。

這樣，我們就可看到，在引用年代因素（為此，民族學家在工作上必須依靠考古學的和文字史料的資料）時，民族學研究的結論就變得更為精確。

蘇聯民族學在研究各個具體的族的文化時，認為各族人民群衆本身是各該族文化的創造者。在這一點上蘇聯民族學和資產階級民族學者有着極大的原則上的區別。後者是以忽視人民在文化上的創造作用為其特徵的。資產階級民族學中，文化被認為是獨立的、脫離人民的，在人民之上的東西。資產階級的民族學家（特別是研究殖民地各國民族學的民族學家），不把文化和各族人民聯繫起來去研究，而主張所謂文化圈說，在他

們這種說法中，文化的真正創造者即具體人民絕對地被排斥了。

因此，民族學是研究各個具體民族的文化形成及其歷史發展與現況的學科。

因此，蘇聯民族學的問題和沙皇時代及現代資產階級民族學的問題本質上是不同的。蘇聯民族學不但不忽視現代生活的研究，反而以此作為注意的中心。並不算很久以前，蘇聯民族學家中間也還有過這樣的呼聲，認為現代生活的研究不能包括在民族學的任務之內，民族學所研究的只應當是現代生活中屬於過去的遺跡，因而從現代生活中去搜求足以幫助我們恢復很遙遠的過去的（而且與其說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不如說是封建時代以前的、原始公社制度時代的）歷史的那些東西。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個別研究人員傾向於認定民族學的主要任務正是在這一方面。但是，這種陳舊的、極錯誤的觀點的擁護者畢竟是已經越來越少了。

今天，我們前面出現了一些重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過程。我們看到新式的、社會主義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被創造出來和繼續發展，我們看到蘇聯各族人民走上了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這在各族人民生活習慣的各方面都有極深刻的反映。如果我們不記述這些過程，不研究這些過程，就不可能徹底瞭解我們時代裏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的發展進程。研究目前在我們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物，是蘇聯民族學家的偉大的、光榮的和重要的任務。

即就恢復過去的歷史來說，就從現代生活中發見過去的遺跡來說，也應當從現代生活的全部複雜性，從現代生活現象的全部總和研究起。何況我們只有在現代歷史中掌握了過去的遺跡之後才能够了解過去的遺跡。為了客觀地、具體地闡明這些遺跡，我們首先應當研究現代生活，並在現代生活中去考

察過去遺留下來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切有關途徑的搜求過去遺跡的嘗試通常會遭到失敗。類似發生在養鹿業問題上的那樣的研究也遭到了失敗。可以指出上十種民族學著作，它們不考慮某些族的歷史現象今天還存在着的具體環境，儘管這種現象的發生事實上顯然較晚，却企圖把它當作很古老時代的遺跡。

可惜我們的前輩，19世紀的俄國民族學家和其他各國的民族學家，只知從事于過去遺跡的搜求，對當時的現實生活很少興趣，結果19世紀各族人民生活的大批有意義的現象，對他們以及對我們來說，都告消失了。我們從前輩的記述中所得到的往往是一幅完全被歪曲的生活圖象，因為他們不從各族人民生活的全部去看各族人民的生活，而是有意地從中摘取過去的遺跡。這就會發生這樣的結果，比方說，我們就不能回答俄羅斯文化是怎樣傳到北方各族中去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前輩，19世紀的民族學家，在記述楚克奇人、科里亞克人或北方其他各族人民的生活時，不是按着他們觀察時期那個本來的樣子去記述，而是根據他們的意見，按着很古老時代的那種樣子去記述的。

在恢復我國各族人民較古遠時期的歷史方面，擺在我們前面的問題也是頗為重要的。斯大林同志曾說過，歷史祇有當它不是研究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而是研究勞動群衆、物質資料生產者、各族人民的歷史的時候，才會成為真正的歷史。絕大部分的文献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知識分子創作出來的，所反映的主要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和一定的階級意識。在這些史料中，各族人民群衆的生活與勞動是說得非常少的。民族

學和考古學一樣，有很多機會去恢復勞動群衆的生活圖象，補充我們文字史料的空白點。

要了解某一個族的歷史，必須去研究它的起源，并從起源時代逐漸了解到它的現代生活。因此，擺在民族學這門科學面前的最重大的任務之一就是研究族的起源問題，研究各個族的起源與形成的問題。沒有民族學的材料，這個問題是不能夠得到充分解決的。

蘇聯考古學的優秀代表者們，早在各族起源問題的研究中依靠民族學的材料，同時證明了某一族現代文化中具有特徵的現象是從遠古時期發展而來的。蘇聯民族學家也依靠考古學的材料從事于每一個族的（現代的或古代的）文化的研究，同時研究那從遠古時期直到現代為止的某一民族文化形式的歷史傳統。我們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正確肯定某個族的起源問題的莫大的重要性，不肯定這個重要性，該族歷史是寫不出來的。

我們還很少發現其他歷史問題曾像起源問題這樣被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民族學、考古學及其他等方面的代表人物歪曲過，因為起源問題的周圍堆積了各色各樣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世界主義之類的思想，起源問題本身也表現出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色彩，這類思想都有一個相同的任務，就是，歪曲各族人民過去的歷史。對於大多數族的起源問題的研究，我們蘇聯民族學家是重新着手進行的。資產階級科學界的代表人物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加以妨害和歪曲。我們今後必須展開大規模的批判工作，否則這些問題便不能實際得到解決。●

❷ 恩·雅·馬爾院士的庸俗的公式主義即所謂“語言新學說”的影響，在蘇維埃考古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起源問題的研究上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斯大林在其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中已令人信服地揭露了馬爾學說的毫無根據。我們已在“蘇聯民族學”雜志1950年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專論。

例如，我們都知道，有一種在西歐產生的並且流傳到俄羅斯科學界的主張，對於我國民族學中研究民族起源問題的那一部門的發展，發生了多麼有害的影響，這種主張斷言，東歐各族人民在遠古時期，即在“考古學上的”年代裏就有了發展，并在不久以前受過西方決定性的影響。

我國文獻中也存在有大量受這類錯誤觀念影響的研究結論。例如，澤烈寧的論東斯拉夫人民族學(*Ostslavische Volkskunde*)的大卷頭著作(順便提一下，該書是用德文出版的)，驟然看來，倒像是有系統地說明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民族文化特點的、敘事體裁的、客觀性的著作，可是，實際上，該書却充滿了錯誤的觀念，它認為俄羅斯族在其全部歷史時期內什麼也沒有創造出來，隨便那一種文化現象(如俄羅斯的房屋、木犁或俄羅斯人的民族服裝——無袖女衫、有褶的女裙、頭飾)的起源都是出自對日耳曼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羅馬人、甚至是對阿拉伯人的模倣。俄羅斯人對他族的影響完全被忽視。俄羅斯人的文化幾乎是一無所有。

否定個別族之間的文化關係和相互影響自然是可笑的。文化影響是不能片面地去看它的，不能只看過程的一面而忽視其另一面，不能忽視俄羅斯族、東斯拉夫各族乃至東歐各族給予西方各國文化上的重大貢獻。但是，關於這方面，澤烈寧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提。澤烈寧的著作的最大缺點就在於它忽視了每一族文化發展的內在過程。

蘇聯民族學家不得不重新進行大量的工作：恢復歷史的真實，客觀地闡明俄羅斯族以及東歐和西歐其他各族文化上所發生的內在的發展過程，并指出這些族在什麼時代相互發生了聯繫，而這種相互聯繫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在這方面，我們面前還擺着很多工作。

讓我們轉過來談談關於原始社會文化研究的問題吧。民族學和史前考古學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同時，大家都知道，在相當有限的範圍內，語言學也研究這個問題。考古學為原始社會發展過程的研究樹立了堅實的基礎，使得物質文化和技術發展階段的交替有被我們發現的可能。但是，要了解原始社會的內在的社會生活，原始意識形態，原始藝術就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廣泛利用民族學的材料。創立原始社會的科學分期的、恩格斯在其經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引用過他的著作的摩爾根之所以是第一位民族學家並不是偶然的。分期問題對於馬克思主義科學，無論過去與現在都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正如列寧所教導我們的，要了解任何一個現象，我們必須研究它是怎樣在歷史上發生的，在它的發展中經歷過哪些階段，以及它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

原始社會史和氏族制度問題過去與現在都是民族學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在這裏，民族學工作可以進行而且正在不僅根據不久以前尚存在的各個族的材料去進行，並且還根據有時候現在還存在着的氏族制度的材料去進行。那些不久以前還保存着，有時候目前還在現代各族的婚禮及其他儀節中被保存着的遺迹的研究，可以對於原始社會史和氏族制度問題的解決提供很多材料。

民族學這門科學所研究的幾個基本的重大問題就是如此。

偉大的衛國戰爭之後，蘇聯民族學研究所在擬訂本所的五年計劃時，曾提出編寫十卷本的綜合著作“世界各族誌”，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這項工作，現在已接近完成。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對所有收集起來的科學的民族學的材料進行一次綜合。這項工作戰前本來就已開始，1946年，我們又在規模更大的計劃中把它提了出來。

資產階級科學界有若干綜合性的主要是德國人所寫的民族學著作，如拉策爾有名的兩卷本，附有圖說的布尚的“民族學”，在法西斯德國時代就已出版的伯爾納茲克的三卷本“大民族學”（Die grosse Völkerkunde）以及若干在其他國家出版的同類性質的著作。這些著作不要說是已經無可救藥地陳腐了，即就其是與真正的科學方法論立場相敵對的立場寫作出來的一點而論，甚至也沒有資格算做可供參考的出版物，因為，我們從這些書裏得不到關於某些族的正確概念，甚至關於德國民族學家很費氣力研究過的各族，例如非洲和大洋洲各族，也是如此。這些族被描寫成為穿戴着五花八門的民族飾物、處在氏族制度中，既不知道有壓迫也不知道有剝削的野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幅被描寫出來的圖畫，和今天在殖民地發生的以及拉策爾在寫作其兩卷本著作時所發生的實際情況是有着霄壤之別的。

我們的任務在於正確地記述現在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習慣。

但是，十卷本的編寫工作證明了，雖然擺在民族學前面的各個問題的解決途徑已經正確地指了出來，許多問題也得到了正確的解決，而我們所搜集的材料對於這樣一種新的出版物來說並不是詳盡無遺的。我們所擁有的全部民族學的記述對於這一族或那一族的實際生活作了不正確的、有所歪曲的說明。我們還必須進行大量工作去恢復各族人民生活的真實圖象。

對於各外國、特別是各殖民地的研究，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去找原始材料。於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現代的報刊，恢復這些國家現代情況的圖景，這樣我們就完成了上述十卷著作中的兩卷：“澳洲與大洋洲各族誌”及“非洲各族誌”。“美洲各族誌”這一卷的編寫工作也快告結束了。

由於準備出版“世界各族誌”而展開的另

一工作，在研究所的五年計劃批准之後便已開始着手了。這就是關於研究蘇聯各族人民集體農莊生活的巨量工作。民族學研究所在最近兩年之內在蘇聯各地區如：奧列湖沿岸地區、阿爾亨格斯克省、外額爾巴阡烏克蘭、帕米爾河沿岸地區、楚克奇及其他各地組織了考察隊。有十五個以上的考察隊和考查組從事現代集體農莊生活的研究。這些研究十分明確地證明了，展開在我們研究者前面的遠景是多麼輝煌，而那種認為現代生活的研究不是民族學家們的主要興趣的觀點，又該是何等錯誤。

最後，我們在說明各族的特點時，似乎差不多完全把工人階級的生活摒棄於科學問題的範圍之外。工人階級的生活也有其自己的民族特點，如果不說明我們蘇維埃社會的領導隊伍即工人階級的生活，就不可能說明俄羅斯及蘇聯其他各族人民的生活。我們已進行了一系列可以在這方面作出相當程度概括的研究工作。

因此，在“世界各族誌”的研究工作上，提出了研究蘇聯集體農民和工人生活的問題、研究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各族人民現狀的問題。

同時，在這次五年計劃快要結束的期間，在綜合這一切材料的時候，我們前面又發生了兩個新的問題，即：（一）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形成問題；（二）外國各族在殖民制度條件下的民族結合問題。這是在不同的環境內進行，發生完全不同結果的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但不研究這兩個過程，我們就不可能完成“世界各族誌”的研究工作，因為，我必須首先確定，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形成或者這一形成過程尚未完結，到底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殖民地民族或其他人們共同體形式的研究到底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關於外國各民族的形成問題我們必須重新提出來，因為資產階級民族學有意忽視這個問

題。資產階級民族學所提到的好幾百個部落和部族，實際上早已進入了資產階級民族結合的過程，指出這種過程，對印度的英國殖民者，非洲的法國殖民者和其他國家的殖民者是非常不利的。

蘇聯民族學研究所在這一次五年計劃中所研究的以及在下一次五年計劃中將要進行研究的一些問題中有一個大題目，即俄羅斯民族學及其鄰近學科人類學和民間文學的歷史。在這次五年計劃中已收集了一些重要材料并將若干初步研究結果以民族學研究所著作集和雜志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這項研究工作證明我們對祖國這門科學的歷史知道得太少。歪曲俄羅斯的文化史是外國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的一個特色，這種風氣也傳染了俄國資產階級的歷史編纂學，結果民族學方面俄國科學界許多最偉大的活動家就被人遺忘了。已經判明，18世紀的俄國民族學比西歐同一科學研究部門作出來的成績還要高得多。19世紀俄國地理學會的研究工作不但對俄羅斯的就是對全世界的民族學研究作出了獨立的、重大的貢獻，我們有責任指出這一點在外國是遭到了有意的抹殺而也被我們自己忘却了。姆·奧·柯斯文、斯·阿·托卡列夫及其他學者曾經指出，一般民族學（尤其是原始社會史方面）上的許多重大問題之被俄國研究者們解決比在外國解決的時間要早很多。我們面臨着恢復這方面歷史真象的任務。我們所進行的初步研究工作使我們深信就在下一次五年計劃中能够寫出一部俄國民族學綜合史。

當前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出版一部全國對我們期待已久的、供高等學校用的民族學普通教程。

民族學研究所面臨的一些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此。除此以外，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所要研究的一些其他重要問題，其研究工作有的已接近完成或者已經完成，例

如，關於氏族制度，特別是關於氏族的起源、形成、瓦解、由氏族制度過渡到階級社會問題的篇幅巨大的論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種。

第二項大的綜合研究工作是關於現代人和現代人類種族起源的研究。蘇聯民族學研究所人類學組正在編寫這方面的論文集。

在這次五年計劃內已經編繪好歐洲的民族分布圖，普·伊·庫什涅爾關於民族地理學研究（即民族學重要部門之一——民族地理學——的綜合研究工作）的專門論文，也完成了準備工作。

民族學研究所還從事于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的民間文學和蘇聯的一般民間文學的研究。1948年曾舉行過關於批判民間文學戰線情況的重大會議。看起來，我們不僅在現代民間文學研究方面，而且在民間文學創作來源的研究方面有很多嚴重的缺點。民間文學研究中滲進了資產階級方法論、臭名昭著的芬蘭學派、李維——布留學派及其他資產階級流派特別是維謝洛夫斯基學派的影響。必須重新審查這個問題，並組織一批研究人員來對這個重要問題作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說明。還應該指出作為人民世界觀的研究材料的民間文學的意義。不能忘記大多數文献資料反映着統治階級的世界觀。人民的世界觀表現在口頭創作上，列寧和高爾基曾經說過要研究這些作為人民之希望的口頭創作。我們已確定了一個研究目標，就是利用革命前後收集家們所積累的極豐富的民間文學材料來恢復俄國人民群衆即農民、工人階級的世界觀的歷史。

以上就是我們研究所目前的一些主要任務，這些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蘇聯全體民族學家的共同任務。在“世界各族誌”十卷本綜合性著作的編纂工作中，參與其事的就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學者、大多數聯盟共和國研究機關的工作人員。研究現代各族人民的生活是蘇聯全體民族學家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研究所在這方面所進行的研究，只有在我國其他科學研究機關與此相應的研究工作的支援之下才能著有成效。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真正繪出我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生活的精彩圖畫。這項工作正在各聯盟共和國如烏克蘭、高加索，特別是在格魯吉亞展開，并且已在它們那裏得到豐富的結果。一九四九年底在第比利斯舉行的高加索民族學家會議，表明了在文化傳統形式的研究上具有很大功績的格魯吉亞民族學家，已轉向于現代生活的研究，并在這個題目上作出了若干有價值的貢獻。

歷史編纂上的問題對於各聯盟共和國的民族學家來說當然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不能把民族學史的編纂僅限于俄羅斯的科學範圍之內。我們還應當指出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學的發展。這個問題不僅已由我們研究所提了出來，而且還作為中心題目之一被包括在蘇聯科學院的計劃之內。應當出版多卷本的大著作“祖國科學與技術史”，其任務是，指出祖國科學特別是蘇維埃時代的科學

的全部偉大之處及其多樣性。

近年來我們對於各聯盟共和國民族學家研究上的聯合與協作做了若干工作。曾舉行過兩次高加索民族學家的聯席會議，一次在莫斯科舉行，一次即上述在第比利斯舉行的會議。現在這次會議也是根據聯席會議的原則，由莫斯科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民族學家聯合舉行來討論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民族學問題的。各聯盟共和國的代表愈來愈多地參加我們研究所每年照例舉行一次的對一年中野外研究工作進行總結的會議。共同考察的組織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日益增多。我們研究所的研究部門越來越多地接受由各聯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基爾吉茲、土庫曼、卡拉卡爾帕克、達格斯坦等等）選送來的青年研究生。所有這些形式及其他形式的聯系無疑地將會發展和加深，而且由於全體蘇聯民族學家的協力我們無疑地會解決那些擺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斯大林時代面前的偉大而光榮的任務。

（劉榮煥譯，原載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簡報”1950年第12卷）